

国际关系史

第六卷

(1939—1945)

本卷主编

石 磬(常务) 刘 陵
洪育沂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光勤

封面设计：雪 声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9.75 插页：4 字数：446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50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关系史》编委会

主 编：王绳祖

副主编：光仁洪 蒋相泽 卫 林 周纪荣
石 磊 鲁 毅

编 委：卫 林 王贵正 王绳祖 王斯德
王德仁 王鹏飞 石 磊 卢明华
光仁洪 朱重贵 朱瀛泉 刘同舜
刘星汉 刘 陵 孙叔林 孙福生
李石生 李肇新 吴东之 吴世民
吴机鹏 何春超 张之芮 张文淳
张兴伯 张 志 张季良 陈文艺
周纪荣 洪育沂 俞 源 唐承运
曹中屏 黄鸿钊 谢益显 蒋相泽
鲁 毅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本卷作者：第一章 陈文波

第二章 周启朋
第三章 石 磬
第四章 石 磬 李树藩 洪育沂
第五章 侯成德 石 磬 洪育沂

第六章 石 磬 周尊南
第七章 刘 陵 曹宏举
第八章 洪育沂
第九章 李铁城 石 磬
第十章 洪育沂 隋兆蔚
附 录 刘 陵



一

国际关系史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不少国家都将其列为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程，并对之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更为重视这门学科，已取得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

多卷本国际关系史，战后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有法国学者勒努万主编的8卷《国际关系史》，前苏联学者葛罗米柯、赫沃斯托夫等主编的5卷《外交史》。两书的内容均偏重欧洲，亚非拉篇幅较少，且各自强调本国在国际

关系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英美学者通贯古今的多卷本国际关系史著作并不多见,断代性的著述居多。如美国学者D·希尔编著的3卷《外交在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历史》;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主持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用编年体记述现代国际关系史(至60年代),共出版近50卷。这些著作均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观点。

国际关系史在中国是一门新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有的高等院校已开始研究和建设这门学科,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尤其从1980年12月成立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以来,对学科建设更为重视,学科队伍得以集中,科研项目有所落实。因此,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包括理论、历史、现状)勤奋耕耘、协同攻关,先后撰写出版了本学科的专著、教材、史纲、辞书、大事记等数十种;发表学术论文千余篇,其中有的填补了学科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编辑或编译出版了国际关系史文件集、论丛、译丛、专刊、资料选集、历史长编等数十卷;专业基础教材《国际关系史》、《近代国际关系史》、《现代国际关系史》、《战后国际关系史》(或史纲)等已编著出版多种。同时,还编著出版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综合性专业理论教材。

正是在取得阶段性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随着中国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形势的蓬勃发展,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友好交往的迅速开展,广大的国际关系史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集体努力,编著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卷本《国际关系史》。这部著作既应注重其学术性,又应重视其实际应用价值,尽可

能做到全面、系统、翔实，以供外交、政治、理论、新闻等领域的工作者以及科学研究人员参考和检索。经过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多年筹划和准备，组成了编委会，组织了撰写队伍，拟定了大纲细目，统一了编写体例，集体编著了这部 10 卷本的《国际关系史》。

二

国际关系史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极为广阔、复杂。但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社会中一切多层次、多方面的繁杂关系通常集中反映为政治关系。因此，国际关系史是以国家与国家（包括国际组织）间的政治关系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注意国际经济关系、军事关系以及文化、宗教关系，并使之与国际政治关系紧密结合，而且也不应忽视重要历史人物在国际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长期以来，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但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时期，除各个民族国家外，又出现了许多非民族国家形式的行为主体。如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以及各地区性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宗教等国际组织与集团。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各自成为单独活动的行为主体。尽管如此，它们与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相比，在国际社会中仍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它们的依靠力量仍然是各个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国家都受自己国家的制约、支配和控制。这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更增加了复杂性。

那么，应当用什么观点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和揭示

其规律呢？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据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各种理论与思潮，以及各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基础发生影响，但“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同时，在同一书信中，恩格斯还指出：历史的创造，“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每个单个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历史的“合力论”，对揭示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和结果是极其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有大量的论著，都是以唯物史观来剖析和阐述历史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故此，我们编著这部10卷本《国际关系史》，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史学科的新体系。其次，着意于探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历史发展进程，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来评价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在不同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略古详今。第三，以世界经济关系为基础，探明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与前因后果，并注意其相互作用与影响。运用历史“合力”的原理来剖析国际斗争的诸多因素与表现，避免把问题简

单化。第四，重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随着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中所显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反映客观的历史演变过程，尊重历史的真实性。第五，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实事求是地阐明历史事实真相，不溢美，不隐恶，履行历史学者应尽的职责。

三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国家，随之就产生了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开始是邻国之间，进而扩大为地区性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种关系，由此就有了国际关系及其发展进程。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因受种种客观条件所限，相互交往和联系既松弛，又不经常，多局限于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或为谋取王族的、宗教的权益而争斗。当时只是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关系格局，还未构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

从 17 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逐步加强，世界贸易范围不断扩大，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渐改进，促使各国和各洲之间政治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社会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在二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世界逐步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形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任何地区的重要事态都会影响或牵动国际关系的全局。

正是基于国际关系这一历史发展进程，这部著作着重从 17 世纪世界进入近代时期写起。其上限为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 年)，其下限暂定为本世纪的 70 年代末。全书共 10 卷，按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主要转折性变化，分为三个时期：

国际关系史 第六卷

第一个时期(1648—1918 年),即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 1—3 卷。

第二个时期(1917—1945 年),即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 4—6 卷。

第三个时期(1945—1979 年),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本世纪 70 年代末。为第 7—10 卷。

本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国际关系,今后将继续编写和出版。

参加撰写本书的作者都是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高职称教师与研究人员,又都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会员。

本书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并得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指导和在出版方面的优先安排,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际关系史》常务编委会

1995 年 12 月



本卷涉及内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破坏剧烈、情况复杂、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战争。

就规模言，参战国家之多（61个国家和地区）、卷入人口之众（20多亿，占世界人口80%）、战场之辽阔、战火燃及范围之广（遍及欧、亚、非、大洋洲四大洲和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四大洋；战火波及40多个国家领土，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双方参战人数不包括游击队多达1.1亿人），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无法比拟的。就破坏剧烈言，战争

伤亡接近 1 亿人，其中死亡 6500 万人以上，苏联人口损失 2000 多万人，中国军民伤亡（八年抗日战争中）达 3500 万人。战争中无数城乡、工矿被夷为平地，大量人类历史文化遗产毁于一旦，损失难以精确统计，且永远无法弥补。参战国物质损失初步估计为 4 万亿美元，占参战国国民收入 60—70%，仅军费即高达 9000 亿美元。其中苏联物质损失占参战国总损失 41%，达 2.5 万多亿卢布，中国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 1000 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血与火的历史，是灾难和牺牲的历史。

“二战”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人民最终赢得了战争、赢得了进步。“二战”是帝国主义集团中最反动、最富侵略性的德、意、日轴心国集团悍然发动的，就法西斯侵略势力发动的战争而言，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旨在把全世界人民沦为奴隶并投入黑暗的深渊。“二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集团之间的全面对抗和生死搏斗。就反法西斯力量的斗争而言，“二战”是解放的、正义的战争，并居主导地位。“二战”的结局是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集团，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浴血奋斗、以亿万人民的壮烈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①

“二战”的胜利对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指出，它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② 周恩来也曾把十月革命的胜

① 《毛泽东选集》1 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03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1 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60—1361 页。

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评价为本世纪世界现代史上三件划时代的大事。

“二战”的经验教训极其丰富深刻。从根本上看，“二战”最主要的历史经验是如何防止和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灾难降临人类以及一旦爆发大规模侵略战争，如何尽快战胜侵略者，重建世界和平。从国际关系看，“二战”期间，一方面全世界侵略与反侵略、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集团、两条阵线，营垒分明，界线明朗，成为战争期间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战争波及和卷入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民族、政治力量和人民群众，参战国目的不同、情况复杂，斗争以战争为主，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形式，国际舞台上呈现出空前活跃、错综复杂的图景。

对“二战”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二战”战争史及国际关系、外交史的研究，历来为国际社会和中外学术界所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许多问题展开了探讨和争鸣。其中，争议较大的有战争起点、分期和性质，绥靖政策实质和起止，苏联对外政策得失，战争初期盟国军事失利原因和经验教训，对重大国际会议评价及雅尔塔体制等问题。本卷作者也积极参加了这些研究和探讨。对学术界许多争论问题，我们写作中处理原则是，一方面提出我们研究心得的一孔之见，请教于学术界同仁；另一方面用“注解”或在行文中介绍其他观点，以供读者分析研究。

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为了战胜共同敌人，结成了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这个统一战线以国际无

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世界人民为基础，同时也包括一切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政府、政治力量和法西斯国家内部的人民和反侵略力量。它“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群众的联盟”。^①统一战线的基本标准是反法西斯。其基本组织形式，在国际上是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民族的大联合，在各国内部是各阶级、各阶层反侵略、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力量划分，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英美之间的政治军事同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为此各国政府和人民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并取得了可贵的经验教训。“二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就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的盟国关系。深入研究和总结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盟国关系，对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由于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要求，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中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和进步民主力量、被压迫民族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当政的有识之士，能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求同存异，对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盟国从基本方面都能坚持反轴心国的原则立场，经济上互相支援，政治上协商合作，军事上配合互助，对取得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参战目的和国家具体政治、经济利益不同，盟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苏联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苏维埃祖国，协助遭受法西斯奴役的国家、民族获得解放，但其政策也有某些扩展本国政治、经济势力的大国主义

^① 《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

的消极因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其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卖国投敌的是少数，多数则参加反法西斯侵略，但也存在着对敌妥协、对人民压制的倾向。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利益、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而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参战目的既有保持既得利益和霸权地位的一面，又有保卫本国独立、反对法西斯侵略和压迫的一面。

这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是战时盟国关系的主要特点。在多边和双边关系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中都有表现。盟国关系的上述特点集中表现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之间多次外交通信和以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为代表的重要国际会议上。首脑外交通信涉及大国间双边关系和战时及战后重大政治、战略问题。^① 在国际会议上，不仅讨论军事上战胜敌人的战略计划和军事行动，而且就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战后防止法西斯侵略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达成了许多协议。此外，轴心国集团内部和英美等盟国间也召开过多次研究重大政治军事问题的双边、多边国际会议。这些都是研究“二战”期间国际关系和主要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重要课题。

“二战”期间的国际关系，从全局看存在四组关系和三种力量。

四组关系是：一、法西斯侵略集团和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关系。这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决定着战争性质和人类命

^① 战时美、英、苏三国首脑，保持着特别密切、频繁的通信关系。估计战时罗斯福与外国首脑通信多达 2000 多封。丘吉尔称战时他致函罗斯福 950 封，收到回信 800 封。苏联公布的三国首脑通信集，收集美苏首脑通信 400 件，英苏首脑 500 件。国际舆论认为，这是有史以来世界领袖之间范围最广、包罗万象的通信。

运。二、资本主义大国、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三种形式：英美等国与法西斯国家的矛盾以及法西斯集团内部和英美等盟国之间战略分歧和具体利害冲突。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两种形式：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军事进攻和反法西斯同盟内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合作与矛盾以及英美当权派中削弱和反对苏联的倾向。四、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关系，呈现了特别错综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法西斯侵略对它们造成了严重威胁；另方面，老殖民主义者虽然有支持它们抵抗法西斯侵略的一面，但在很大程度上仍顽固坚持反动的殖民政策，美国则打着反殖民主义旗号，企图取英法地位而代之。从全局看，第一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主要矛盾，其他关系都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但各组矛盾又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构成了战时国际关系的复杂局势。

三种力量是：

一、以苏联、各国共产党、进步力量为核心，以被压迫民族、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世界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其战略方针是彻底击败法西斯侵略者，大力发展进步、民主和民族解放力量，并为战后和平、民主事业奠定可靠的基础。其斗争任务是组织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要斗争形式是军事斗争。世界反法西斯民主力量要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要加强盟国团结，特别是五大国和美、英、苏三大国的团结与合作。对美英等反法西斯的主要资本主义大国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联合并支持其反法西斯侵略的积极面，这是主要的；又警惕和批评其反苏、反人民、反对民族独立和争夺霸权的消极面。对法西斯集团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反对妥协投降；策略上贯彻孤立少数、各个击破、分化瓦

解、缩短战争和减少损失的原则，并把法西斯侵略集团与人民群众严格区别。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军事上承担抗击法西斯集团元凶纳粹德国的重担，并击溃了其主力，最后直捣法西斯巢穴柏林；接着又挥师东下，在击溃日本关东军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联在建立和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苏联的外交政策和斗争策略，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迄今仍可作为借鉴。但苏联在处理国家关系上也犯有大国主义、损害别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错误，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最先遭受侵略，最早点燃反法西斯斗争的烈火。中国各族人民、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进行全面抗日战争，取得了近百年来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战场是“二战”中开辟最早、持续最长而又最后结束战争的战场；中国一直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是击败日本侵略军的主力军；中国人民承受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抗战极大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英美和苏联的反侵略战争，为“二战”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博得了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中国人民的斗争经验，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任务是支持和督促本国政府坚决抵抗法西斯侵略，主张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政治和军事同盟；同时反对政府的妥协倾向，并迫使其改变不利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做法和旧的殖民政策。

法西斯国家人民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条内部战线。